

兴、观、群、怨：中华美学精神管窥

□黄力之



“兴、观、群、怨”见于孔子《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处之“诗”，乃是指经孔子自己删定编辑并作为教材的《诗经》三百篇。由于《诗经》中的诗与后世之诗只存在某些形式的差异，并无本质区别，所以，孔子所论可视为基本的美学判断，乃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构建。

对于孔子的“兴观群怨”四字之含义，后人多有注疏。如魏何晏《论语集解》中，引孔安国：“兴，‘引譬连类’；引郑玄：“观，‘观风俗之盛衰’；引孔安国：“群，‘群居相切磋’；引孔安国：“怨，‘怨刺上政’”。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中，将“兴、观、群、怨”注为：“兴，感发志意；观，考见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可以看出，在具体理解上有些差异，但总的共识在于，“兴观群怨”乃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揭示——兴为情感作用，观为认识作用，群为凝聚作用，怨为批判作用。

从“兴、观、群、怨”看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

从这四个作用或者功能的表述来看，“兴观群怨”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第一个贡献在于，就中华美学精神而言，在孔子的时代，中国人对文学艺术社会功能的认识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

须知，《诗经》中的作品只是当时的诗歌写作范式，如果展开整个中国诗歌史，无论从诗歌的内容还是从形式说，这种范式都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的。比如仅就诗歌的情感表达而言，后来唐宋的李白、苏东坡诗词中的狂放细腻显然在总体上要超过《诗经》中的篇章。如果展开整个文学史，那么这种局限性就更大。如“诗可以怨”，诗三百篇自然可以证明这一功能的存在，著名诗篇如《硕鼠》，全诗将统治者视为老鼠，贪得无厌而寡恩，进而表现下层民众对其愤恨之情。可是这毕竟是一种有限性叙述，角度不够广阔，只有在后来叙事文学发达起来以后，“诗可以怨”的功能才充分展现出来。“诗可以观”亦是如此。只有在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文学的百科全书功能才得以展示，马克思就说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得到的东西，比从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里得到的还要多。

正因为诗三百篇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兴观群怨”的美学贡献才显得异常突出，因为这一理论突破了创作实践的限制，以微观见宏观，以单一形式功能窥见未来整体的功能，体现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当今天的《文学概论》在系统性地论述文学艺术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时，不要忘了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超越性。

当然，由于孔子在“兴观群怨”之后又写了一句话，“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就冲淡了“兴观群怨”的全面性，变成了对诗歌的单一功利性要求，把诗歌理解为解决人伦纲常关系的工具。后来的《毛诗序》发挥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可能与东汉经学家对这个文本的修改有关，当时的儒学已经赤裸裸地为王权统治服务，西汉初期毛萸的

论点被加以符合时代特征的篡改是可能的。于是，孔子论诗的观点被冠之以“诗教”，即通过诗歌的学习传授使人成为社会需要的人。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社会所需要的人就是遵守规范的人，忠君孝父。《礼记·经解》中说了孔子对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之作用的想法：“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是孔子诗教中所谓“思无邪”、“归于正”之意。显然，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再到“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孔子的“兴观群怨”论由全面的审美功能论走向了片面的工具论，导致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一次资源浪费。

以“诗可以兴”为首位：遮蔽不了的审美真谛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问题又回到“兴、观、群、怨”原初论述本身，会发现期间经历了一次解构与颠覆，就是说，“兴观群怨”论其实本来就内含反工具论的指向，因为，“兴观群怨”论的全面的审美功能不是一种外在拼凑，而是由内在的结构所决定的，就是说，从内在结构说，“兴观群怨”论本来就没有把工具论置于首位，审美情感才是“兴观群怨”论的首要结构因素。可以说，将审美情感作为审美对象（作品）的首要结构，这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第二大贡献。

事实上，“兴观群怨”论的原初文本就是把“诗可以兴”作为四个“可以”之首的，阐释者不应妄自倒置。当然，这里又涉及对“兴”的理解问题。关于“兴”的解释是有难度的，朱自清先生说这个问题是“缠夹不清”，“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尽管如此，依据逻辑和实际使用，还是可以求得一定共识的。比如，将“兴”解释为诗的起句、起情、譬喻、托喻等意思，当然符合诗经六义之说。但是，此处如果只是指写诗的手法，为什么后面的观、群、怨都是指功能与效果呢？这在逻辑上就有问题。

而从词义上说，“兴”的本义为兴起，引申为人的情感的激发。《孟子·尽心下》中就称圣人为“百世之师”，“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这里的兴起就是因感动而奋起。《世说新语·赏誉》有一句是“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这里的“兴会”就是指高兴的情感。

而在写诗与读诗的过程中，兴起的主体是人，而在精神生活中的兴起当然是精神本身，而不是生理活动。就是说，“兴”只能是一种情感的兴起、兴会、兴发感动，而不只是一种创作手法。由此，后来者言诗，对“兴”的理解和重视远超过六义中的“赋比兴”之含义，例如：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曰：“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其“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就是指作品之华美来自作者的内在情性，由此才有叔夜（嵇康）性格豪爽，故文章“兴高而采烈”，兴高即情感高涨，采烈即辞采犀利。

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人，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

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在说过“诗人吟咏性情”后，马上接着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这里，“吟咏性情”无疑是“兴趣”的基本含义。

明谢榛《四溟诗话》云：“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清吴雷发《说诗菅蒯》也说：“诗固以兴之所至为妙。”清焦循《毛诗补疏序》云：“夫诗，温柔敦厚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今人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便将“兴”解释为“排遣情感”。可见，把“兴”看成艺术创造的真正动因，承认审美情感是审美对象的第一结构，并非个别见解。

由是观之，“兴观群怨”论把“兴”列为首位，并非随意为之。乃是因为，“兴”为后面的“观、群、怨”之前提条件，当人们面对诗的时候，这个对象必须是诗，而诗之发生就在于作者以情人诗，读者因诗生情，这就是“诗可以兴”之真实含义。一个读者在欣赏诗歌包括一切艺术作品时，只有当他感觉到并沉浸入种种人生体验，从而激发自己的情感时，然后才会发生“观、群、怨”的功能。倘若不能发生情感体验，不能“兴”，那么就会弃之不顾，后面的“观、群、怨”功能便无从谈起。这就是审美对象的结构功能，“兴”的首要排序是不可更改的，无论出于多大的功利要求也不能改变，因为改变了就不是诗，不是诗就无所谓“兴观群怨”了。

任何思想都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一方面，孔子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安人心而立秩序确实是当时社会的内在需要，将《诗经》立为整合人心的教材便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诗教大行其道，工具性要求遮蔽了诗歌本身的审美本性。另一方面，《诗经》的时代是文学成熟、成型、多样化的前史时代，甚至文史哲还混为一炉，尚未分家，也就是文学的非自觉时代。人们真正认识到文学的审美本性，欲待另一个时代的到来，即魏晋时代的到来。

1975年5月至9月，毛泽东就魏晋文化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其中就谈到：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大地发展了“诗言志”的简单口号。

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先秦以来，“诗言志”的口号就有简单化倾向，排斥了文艺的情感性基本特性，这是与儒家的诗教（经学之重要内容）有关系的。而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诗缘情而绮靡”不过是恢复了“诗可以兴”的第一因素地位而已。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完全肯定这个基本观点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所谓“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这一判断，最适用的就是审美活动。在审美活动中，“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离开激情、热情，那种“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的审美活动便不复存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鲜活、多维、丰富的，作家对社会生活体验和理解的深度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高度。在这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包含浓郁民族民俗特色的优秀作品，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的马识途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正如四川大学李怡教授所言，马识途是位有张力的作者，成绩斐然。他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十分重视受众的要求，希望能够写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不仅仅是抒发个人的胸臆。马识途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主要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的民风民俗极为熟悉。他的文艺作品中，尤其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源于他孩童时就生活在极具四川风味的民俗环境中。吃火锅、坝坝宴以及“吃讲茶、断公案”的地方习俗，摆香案、请喝酒、烧纸钱的民间风俗，婚俗、丧葬、寿礼、祭祖等民俗活动，都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中，成为他文艺创作中充满活力的血肉。而且，马识途注重将富有民族和地域特征的民俗材料，以“摆龙门阵”的叙述语风，运用于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之中。他擅长将一些蕴含四川地域特色的意象、故事情节和叙述穿插在一起，不仅表现出浓厚的地域审美特色，还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思考。因此，从文艺民俗学角度对马识途先生的文艺创作进行研究，对进一步阐释其文艺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张曼昉的《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马识途创作研究》一书娴熟地运用目前国内文艺民俗学的研究成果，重点从文艺民俗审美这一视角切入，对马识途文艺作品的民俗书写进行学术观察。全书共分为四个章节，首先从文艺创作民族化问题阐述了文艺民族化与民俗审美之间的关系，揭示出马识途文艺创作民族化的审美价值；继而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民俗意象、民俗结构及川味语言四方面论述了马识途文艺创作中的民俗表达。著作将马识途文艺作品中体现出的民族性格、民族审美趣味以及独特的民族审美情感活动与其深刻的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分析蕴含其中的崇高美学风范，对读者理解民族精神和作品世界的构成提供有益帮助。同时著作还深入分析了马识途文艺作品中的民俗背景以及由民俗风物构建起的民俗生活画卷，阐释其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情思。其中极富意味的是作者专章论述了马识途小说中的“茶”及茶馆，在茶趣、茶人之中展现了作者特有的民俗叙事视角，体现了民俗生活审美意趣。作者还将之与另两位川籍作家李劫人、沙汀笔下的茶馆加以对照比较，展示出不同的功能性主题意义。在内容分析之外，著作还重点聚焦到语言及结构形式上，对马识途文艺创作中的结构及情节设置、叙事语言及幽默讽刺的叙事风格等逐一赏析，揭示其“摆龙门阵”的语言风格，指出有别于其他四川本土作家的独特文化艺术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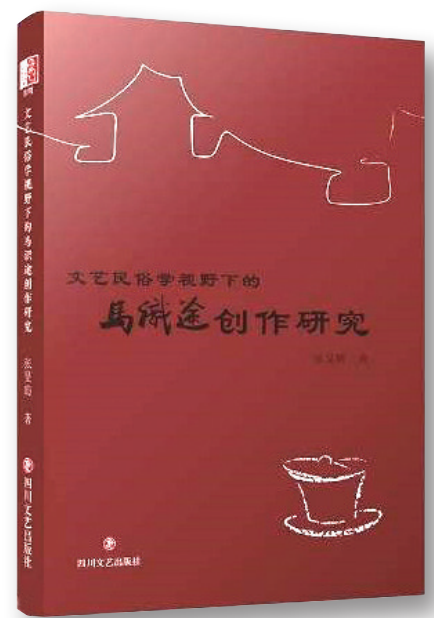
张曼昉是系统研究马识途文艺创作的青年学者。她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马识途创作研究》中，从文艺民俗审美这一视角展开对马识途先生作品的剖析，视角独特。著作分析系统而深入，显示出作者雄厚的理论积淀和广阔的研究视野。系统的文本细读更使得她在研究中能够对研究素材调度自如、信手拈来，与文艺民俗理论相互印证。文字表达严谨又不乏理趣，不失为一本适合马识途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阅读的好书。

理论与文本的相向而行，是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本阐释路径的。这本学术专著的作者认为，就文艺创作本身而言，无论是厚积薄发，还是妙手偶得，都需要用心推敲、用情打磨，生动表现出创作者的理念、兴趣、情志等，在审美视角、叙述技巧、表现方式上彰显出应有的民族气派，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文艺作品本身是否建立在扎实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象符号，必须要有独特的标识性，否则就没有生命力。而这个所谓的独特的标识性，需要切实在民俗细节中进行挖掘和展示，唤醒读者的认同感，作品才会在经久不衰的口碑相传中，沉淀于历史的脉动与社会变革的底蕴中，成为经得起时间和人心考量的经典之作，甚至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这样的观点我非常赞同。真正优秀而经典的文艺作品，绝非人云亦云、粗制滥造，甚至抄袭模仿、千篇一律，只写一己之悲欢，脱离大众也脱离实际环境，脱离了实际的无根之作，徒有文学之名，并无文学之本，失去了文艺形式应有的素质功能和艺术品格，缺乏文艺的原创性和创新性，更本质的是缺乏对人生价值及文化观的实践性表达，缺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对生活的热爱。这是我们从马识途等老一辈作家身上所感悟到的。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评张曼昉的《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马识途创作研究》 □邱明丰

若非妙手偶得，必然独具匠心



（上接第1版）

据悉，出版社未来将在出版流程各环节全面提升“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征稿水准和执行效果：

——在拓展作者资源方面，将加强与重点作者的定向沟通，注重发掘有朝气、有潜力、有阅历、有泥土气息与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和网络作家，鼓励、支持、引导他们成为新时代文学精品创作的有生力量。

——针对来稿作品开展质量提升计划，采取多种模式对作品进行分类指导、打造精品。例如，主题符合要求、创作水平不错但时间跨度长的作品，要有侧重点，加重当代分量，突出新时代；题材符合要求、创作稍显稚嫩但有挖掘潜力的作品，要加强指导，扣准主题，调整构思，优化素材，探亮点，丰富内容；符合要求基本成型的作品，要精益求精，通过改稿会、研讨会等进一步提升优化。

——进行影视改编和孵化，推动创作计划成果融合发展。针对能够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形成重要文化现象、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优秀作品，推动其向影视、戏剧、网络音视频等文艺形态和传播介质的IP转化，不断强化文学作品知识产权的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开发利用。通过加强文学与新媒体新业态、新技术的交融交汇，推动创作计划成果充分释放文学潜能和价值，持续提升文学传播的影响力和到达率。

——通过国家对外翻译项目及版权代理机构，大力推动创作计划成果“走出去”，实现图书出口、达成版权贸易，利用国外出版机构推出外语版本，用本土语言向当地读者传播中国“山乡巨变”的感人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路英勇还介绍说，围绕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有关的作者、作品和涉及的故事原型等，作家出版社各部门将通力合作，不间断推出融媒体创意产品，分时段、跨平台、多圈层、分众化推送，持续为创作计划成果市场影响加热升温，充分挖掘创作计划成果的价值，形成多介质产品集群效应和品牌效应，充分释放创作计划的巨大能量，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收获。

第二届全国少儿国画大展在京颁奖

本报讯 7月24日，“经典传承——第二届全国少儿国画大展”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有关方面领导、主办方代表、少儿美育专家和书画艺术家代表、本届大展的优秀组织机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选手及其教师家长等参加。

“经典传承——第二届全国少儿国画大展”是书画频道和中国艺术档案学会共同主办的大型公益文化项目，自启动以来得到广大少年儿童美术爱好者及教师家长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产生了广泛影响。活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少年儿童美育素质为宗旨，以践行落实“美育从娃娃抓起”为主导，力求通过传统水墨文化基因和红色经典文化基因的相互融合，助力广大少年儿童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与未来。

典礼上，有关嘉宾分别为获得本届大展经典传承特等奖、经典传承奖、优秀奖等奖项的选手和获得本届大展优秀组织奖的机构颁奖。获奖选手代表还为艺术家献花并佩戴红领巾，感谢前辈们的悉心帮助。活动现场同期举行了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精彩文艺表演。颁奖典礼开始前还分别举办了本届大展的名家互动创作环节和少儿美育讲座，艺术家们不仅在构图、笔墨、着色等方面对小选手的绘画创作给予指导，同时通过生动精彩、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小朋友们懂得欣赏美的艺术、收获美的思考。

主办方表示，本届大展在各方努力和支撑下圆满收官，反响强烈，可谓国画新苗代相传的一次美育盛会。书画频道今后将继续与学校、家庭和社会携手共进、精诚合作，将“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画大展”这一少儿美育品牌工程办下去，使之成为广大少年儿童展示艺术才华、绽放人生梦想的舞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化艺术的力量。（范 得）

《烈火芳菲》讲述胶东土地的尘封往事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和山东书城主办的“英雄和乳娘：留在大地上的芬芳——铁流、赵方新长篇纪实文学力作《烈火芳菲》分享会”在济南举办。山东省作协主席黄发有、副主席孙书文，以及该书作者铁流、赵方新围绕本书分享了胶东土地上的尘封往事。

《烈火芳菲》是铁流和赵方新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作者爬梳史料，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和采访，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谱写了胶东女性不为人所知的动人篇章。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员不顾自身安危，与日

埃里克·约翰逊摄影作品首次在华展出

本报讯（记者 王冕）7月22日，由今日美术馆和天禹文化主办的“奇梦幻境——埃里克·约翰逊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不仅是瑞典视觉艺术家、超现实主义摄影家埃里克·约翰逊在中国内地的首次个展，也是其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大规模展出，旨在为中国观众带来一场集视听、触觉和情感体验于一体的超现实沉浸式艺术之旅。

埃里克·约翰逊擅长将天马行空的幻想和荒诞的梦境变为真实的影像作品，为静态的摄影作品赋予极具戏剧冲突的流动意识。他的作品大多诙谐幽默，其中看似奇幻的情节和令人费解的意象表达，往往包含多重寓意，反映了他的生活、想法和计划。约翰逊特别为此次中国首展甄选了80

幅代表性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以摄影和后期技术为创作手段，构建出令人惊叹的创意视觉。同时，展览通过影像作品与视频装置的结合，以多媒体交互式场景的形式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完整呈现了艺术家多年来的创作轨迹。

此次展览由“梦的开始”“我眼中的世界”“记忆倒带”“私人领地”“未来可期”“致敬艺术家”“结束语”七个篇章串联，每个篇章在展厅内的所属区域分别饰以不同主题色。约翰逊坦言，萨尔瓦多·达利、雷内·马格利特、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等超现实主义大师都是自己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展览中，观众可以尝试探索他们的笔触和踪迹，感受超现实主义历久弥新的魅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

王向峰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大学教授王向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9日在沈阳逝世，享年91岁。

王向峰，中共党员。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手稿）的美学解读》《古典抒情诗鉴赏》《艺术的美学基点》，散文集《缪斯的陨落》，诗集《方舟之恋》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辽宁文学奖等。

向求纬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向求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19日在重庆逝世，享年76岁。

向求纬，笔名向鸿，中共党员。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巴山老知青》《喊海谣》《三峡文物沉浮录》等。曾获重庆文学奖等。

肖黛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顾问肖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16日在成都逝世，享年67岁。

肖黛，女。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寂寞海》《美丽的女人》《一切与水有关》《骆驼泉的故事》等。曾获青海省文艺创作奖等。